

“9·11”以来中东民族问题的新发展与新特点

王 联

内容提要 本文以“9·11”以来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苏丹、土耳其等国民族问题的新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中东地区在经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民族问题的新特点,指出政治与宗教、国际与国内、中东与世界的互动,是当前中东民族问题发展中的三组关键性要素。

关键词 中东 民族问题 新特点

一、民族问题与中东政治发展

现代中东政治的发展肇始于20世纪中东各民族的觉醒和一个又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基于对既往强盛历史的缅怀和近代遭遇西方列强蹂躏的现实,当代中东各国无不以建设强大、富裕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为己任,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的现代化。在探寻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国家在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同时,也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一些问题遗留至今,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首当其冲的就是民族问题,特别是在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国家建设应否以某个民族为主体?如何确保国家在主体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对于跨界民族,如何确保各自所在国家的利益优先?民族国家间的联合如何保证成员国各自利益不受影响?泛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等等,不一而足。不少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极大地阻碍了当代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

综观当代中东,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不存在少数民族以及民族问题的国家很少。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不仅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长期存在,而且在阿拉伯国家内部,民族矛盾也一直没有消除。正如埃及开罗美利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指出的那样,“中东阿拉伯地区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但这一地区1945年以来爆发的武装冲突,占全世界武装冲突的25%。其中,大多数是由民族问题引起的”。¹

毫无疑问,民族问题是中东各国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由于历史上的民族迁移、交流、混血和帝国统治的频繁交替,加之地理边界的摇摆不定,中东地区的民族关系异常复杂而多变,跨界民族问题以及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层出不穷。当代中东除了个别国家民族成分相对单一外,大多数国家的民族关系格局基本上都是一个主体民族外加多个非主体民族共处的局面,而一国的非主体民族,在别的国家很可能却是主体民族。这种状况往往导致一国内部主体和非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扩大为国家间的民族问题,即两个主体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地区安全的不稳定。

与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不同的是,带有跨国界性质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不仅影响到争端各方的

¹ 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冲突与建国》,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2期,第73页。

国家间关系,还由于宗教、文明等因素的推动,最终严重影响到地区战略安全格局的变化和全球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正是由于当代中东地区民族问题的普遍化,加之国际势力的介入和干预,使得当代中东的民族问题、民族冲突成为影响地区安全乃至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看法,本文主要选择“9·11”以来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苏丹和土耳其等地民族问题的新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着力探讨中东地区在经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民族问题的新特点,指出政治与宗教、国际与国内、中东与世界的互动是当前中东民族问题发展中的三组关键性要素。认清这三组要素之间的互动,不仅有利于对当前中东民族问题的认知和理解,而且也有助于进一步观察中东民族问题的内在特征及其后续发展。

二、“9·11”事件后中东民族问题的新发展

“9·11”事件后,美国加紧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全面主导中东事务,对地区民族冲突横加干涉,以反恐为名,将恐怖主义与特定宗教和民族挂钩;随后又给反萨达姆政权的斗争贴上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标签。正如中东问题专家李绍先先生评论的那样,“在美国的‘辞典’里,国际恐怖主义就是伊斯兰极端势力,而中东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核心地带,所以美国下决心对中东、对伊斯兰世界实施改造”。¹

美国图谋利用其单极霸权破除对自身的所有“威胁”,更试图通过两场反恐战争使美国成为中东新秩序和地区安全新规则的“缔造者”。然而,事与愿违,由于美国的“双重标准”,以及偏离“9·11”以来的反恐轨道,美国“改造”中东的计划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中东地区民族冲突进一步加剧和扩大的趋势也没有因两场反恐战争而有所遏止,相反,大国的外部介入更加明显,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愈加剧烈。

(一)塔利班势力未被彻底摧毁,相反却卷土重来

自19世纪以来,阿富汗就一直是大国竞相争夺的地方。自从英国、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铩羽而归后,在20世纪最后的10年里,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之中。有评论指出,“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地理上看,阿富汗都是个不幸的地区……阿富汗的不幸就在于它是万山之中一条重要的天然通道,是沟通欧亚必由之地”。^④由于战略位置重要,填补苏军撤离后的阿富汗政治真空显然是美国梦寐以求的。“9·11”事件给了美国最好的攻打阿富汗的理由,且在战后顺利驻军阿富汗境内,甚至还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周边国家驻军,成功实现了美国的既定战略目标。这场以清除恐怖主义、打击宗教极端势力为旗号的战争,由于掺杂了美国的私利,最终并没有真正有效地解决导致阿富汗内战的民族、宗教冲突等问题。

随着2003年美国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军兵力在阿富汗投入不足,追捕本·拉登和塔利班领袖奥马尔的行动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从而使塔利班残余势力得到了喘息机会。而卡尔扎伊总统上台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不断清除由其他民族组成的北方联盟在政府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试图对由普什图族人构成的塔利班进行分化,招安其中的温和派。尽管效果不很明显,但清剿塔利班的步伐却是明显放缓了,这为塔利班势力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外部条件。

从2005年开始,塔利班逐步恢复元气,其袭击也变得更有组织和更具威胁。7月,奥马尔自塔利班政权倒台以来首次“现声”,号召阿富汗人对美军发动“圣战”。奥马尔的录音讲话显示,在塔利班的核心层组建了反政府的民族联合阵线,吸收了普什图族以外的反政府头目参加。2006年上

¹ 李绍先:《伊战怎样改变了中东?》,载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2004/Mar/520400.htm>。

^④ 《阿富汗战争与中国》载《凤凰周刊》,2001年11月。

半年,阿富汗抗击美国及其盟军的事件不断发生,造成军民死亡 1700 多人,其中包括 70 多名美国和其他外国军人。¹ 英国驻阿富汗的最高指挥官理查兹 (David Richards) 在伦敦指出,阿富汗已经“接近无政府主义状况”。他说:“北约国家以为 2002 年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就会万事大吉,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指出阿富汗到处存在部落冲突以及军阀操控的宗教和世俗力量的斗争。^④《纽约时报》2006 年 7 月 23 日也发表社论指出,“美国及其北约盟军的伤亡人数自 2001 年以来不断上升。塔利班政权再度崛起,特别是在他们传统的南方和东南方地区”;“美国所支持的(卡尔扎伊)政府有在为赢得人心的战斗中失败的危险,如果这一战斗失败,就不可能取得打击塔利班及其基地同伙的持久的军事成功”。^⑤ 美国著名记者卡普兰也报道说:“在阿富汗乡村,真主和部落比任何民选的议会更有影响。谁能提供安全与基本的必需品,谁就会受到拥戴——不管他们采取何种手段。”^⑥ 尽管此后美军展开新一轮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如同美国在中东其他地区一样,似乎正走入一个怪圈:越反越恐,塔利班势力不仅赢得喘息机会,而且正在实施战略反攻。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台伊始,就宣布增兵两万支援阿富汗反恐战争,此后又发布所谓“阿富汗”(Af-Pak)新战略,证实 2001 年为英美联军击溃的塔利班组织,如今已经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由此可见,阿富汗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并不能因英美联军先进的军事武装力量就能简单地加以解决,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不改变,阿富汗的民族冲突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

(二)伊拉克境内民族和宗教对立加剧

2003 年 3 月 20 日,美国以反恐、防核扩散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又一手操控伊拉克国内的民主选举,继临时政府组建、公投通过新宪法后,组建了战后伊拉克新政府。然而相对于战场上的狂轰滥炸和组建新政府之易,治理战后的伊拉克却显得难上加难。伊拉克固有的民族、宗教矛盾并没有因美军的到来和萨达姆政权的垮台而有所收敛,相反,自从布什于同年 5 月 1 日正式宣布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以来,伊拉克战后乱局从最初的打砸抢烧事件逐渐演变为有组织、有目标、有规模的武装抵抗,以及针对无辜平民和英美联军的暴力恐怖袭击。萨达姆政权垮台后,逊尼派穆斯林的政治影响力江河日下,伊拉克长期受压的其他各民族、宗教派别纷纷崛起,如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各种政治和宗教派别重新分化组合,形成派系林立、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此前宣称要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给伊拉克自主决定自己事务权利的伊拉克战争,却使伊拉克人民在战后陷入民族矛盾加深、宗教对立加剧的艰难境地。

众所周知,伊拉克民族和宗教矛盾极为复杂。阿拉伯人是伊拉克的主体民族,伊北部则主要居住的是库尔德人;在宗教上,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却分成什叶和逊尼两大教派。此外,还有众多部落势力,在伊拉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萨达姆在任时,竭力掩盖各种矛盾,以政治高压维持仅占人口 20% 的逊尼派阿拉伯穆斯林对国家政治生态的控制,维持了伊拉克的领土

¹ 黄绮淑:《塔利班在阿富汗卷土重来》,载《联合早报》2006 年 7 月 28 日。

^④ “NATO Chief: Anarchy Looms in Afghanistan”,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July 22, 2006 <http://wpheral.com/articles/474/1/NATO-chief-Anarchy-looms-in-Afghanistan/Feuding-agencies-compound-problem.html>

^⑤ “Losing Ground in Afghanistan”,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06 http://www.nytimes.com/2006/07/23/opinion/23sun1.htm?_r=1&oref=sbg in

^⑥ Robert D. Kaplan, “The Taliban’s Silent Partner”, *New York Times* July 20, 2006 <http://www.sacbee.com/content/opinion/story/14280298p-15088691c.html>

统一。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原先被压抑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有如被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形成伊拉克国内十分复杂的民族、宗教对立的新局面。

一方面,反美武装与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交织互动,形成复杂局面。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境内频繁爆发的武装袭击事件反映了不少伊拉克人有反美、仇美心理。由于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短期内不会结束,因而美英占领与伊拉克人反占领的斗争仍将继续,并对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要影响。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伊拉克反美武装中既有萨达姆政权的残部,也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势力。例如,萨德尔从伊拉克什叶派领袖一举成名为“反美英雄”,掀起了狂热的宗教崇拜。而各种国际恐怖势力也趁机利用这一形势,加速与宗教极端势力的合流,不断采取恐怖袭击的手段攻击外国驻军甚至平民。这是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民族与宗教问题的一个新动向。

另一方面,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大势力围绕权力分配争斗不断。2005年12月,根据新宪法伊拉克举行了战后首次正式议会选举,但由于议会三大政治力量就新政府总理人选迟迟未能达成一致,权力真空状态使伊拉克暴力不断加剧。2006年2月22日,位于巴格达以北萨迈拉的什叶派宗教圣地阿里·哈迪清真寺遭到炸弹袭击,清真寺金顶被严重损毁。由于担心遭到以暴易暴的宗派杀戮,大量伊拉克人被迫迁徙。伊拉克濒临内战边缘的传闻不绝于耳,就连2006年7月底卸任的英国驻伊拉克大使佩蒂也警告说,伊拉克“更可能”陷入内战而不是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国家,最终很可能形成不同种族和教派分裂的局面。¹

2006年4月22日,经过艰苦谈判,伊拉克各方终于打破自2005年12月议会成立以来长达4个月之久的政治僵局,伊拉克过渡政府总统塔拉巴尼在议会会议上得以连任,议会最大党派什叶派政党联盟推举的贾瓦德·马利基被任命为伊拉克战后首届政府总理。而过渡政府总理贾法里则由于任内在平息国内恐怖暴力活动、教派冲突、平衡各派权益以及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等许多方面乏善可陈,遭到逊尼派和库尔德政党的一致反对,未能连任。

因此,对伊拉克新政局的观察,离不开对上述三派政治势力的分析。萨达姆时期高压强权政治的终结,极大地释放了伊拉克国内各政治力量参与政治改造进程的能量,预示着伊拉克新政府必须考虑国内宗教、民族和政治派系的客观存在。只有议会中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个主要政治势力分享权力并达成均势状态,才能长期保有权力,这是伊拉克政治的现实,也是美国企图继续影响伊拉克国内政治并贯彻实施其中东计划的不二法门。

毫无疑问,伊拉克新政府于2006年5月上台,只是伊拉克重建进程中的一个步骤,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确保了这一步的迈出,但却不能保证平衡本身的稳定和长久。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实现伊拉克的民族和解和宗教对立情绪的消弥。正如新华社评论指出的那样,“什叶派内部的激烈争夺,逊尼派对政府难以消解的疑虑,中央与库尔德自治区对石油重镇基尔库克控制权争夺的升级,都使伊拉克的和平与稳定面临严峻考验”。^④自从2003年3月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以来,伊拉克国内的民族、宗教对立就再也没有停止过,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难辞其咎。

(三)阿以局势变得有利于以色列

“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推行先发制人的战略,以反恐和民主化改造中东为战略主轴。以色列与敌对势力的斗争都被冠之以“反恐”的名号。以色列自称是巴勒斯坦“恐怖袭击”的受害者,迅速举起反恐大旗,对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国,动辄以反恐为理由,实施美国鼓吹的先发制人的打击,采取定点清除的做法,拒绝与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对话,进

¹ 《卸任英国大使:伊拉克可能分裂陷入内战》,载《联合早报》,2006年8月4日。

^④ 高山、付一鸣:《伊战六周年:“伊人治伊”举步维艰》,载 <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9000086.htm> | 2009年3月20日。

一步加剧阿以局势的紧张。

萨达姆是巴勒斯坦反以斗争的重要支持者。伊拉克民众多次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游行。在自身受到联合国制裁的情况下,萨达姆甚至还为巴人体自杀炸弹的实施者颁发高额奖金以资鼓励和支持。战后伊拉克改朝换代,不仅巴勒斯坦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者,而且也使得激进势力的影响在巴以冲突中逐步上升的势头受到遏制。此外,伊拉克战争期间,利比亚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和开发,全面展开与美国的合作,也使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失去了一个过去一直坚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反以斗争的力量。

伊拉克战争也加剧了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分歧,导致阿拉伯国家整体力量被进一步削弱。伊拉克原本是阿拉伯世界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轻易被美国击败,使得阿拉伯世界的反美力量被进一步削弱。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上,阿拉伯世界也明显分成三派。一派以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为代表,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一派以埃及和沙特等国为代表,它们都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实力的大国,又是美国最为倚重的中东盟友之一。它们尽力充当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中间人,既避免得罪美国,又避免进一步刺激各自国内的反美和反政府势力。另一派以叙利亚为代表,坚决反对美国动武。由于阿拉伯国家间的分歧,阿盟一如既往地未能发挥出有效的整合作用。虽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进行中,阿盟连续召开了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呼吁阿拉伯国家不要向美国提供支持,以及给予战后伊拉克临时政府更多援助等,但这些决议都只停留在纸面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在海湾战争期间,埃及和沙特还能在阿拉伯世界发挥一定的领导作用,对其他阿拉伯小国发挥影响;但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各国多倾向于自保。作为一个整体,阿拉伯国家在战后中东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

战争的结果造成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略平衡进一步地向以色列倾斜,使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进程的谈判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美国总统布什更是“一反美国历届政府传统,六年多来对以色列的无条件单方面支持,使得以巴双方的深仇大恨恶化到无法缓解的地步”。¹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抬高政治谈判价码,不惜中断与巴勒斯坦自治当局、黎巴嫩和叙利亚政府间的谈判,一切以以色列的意旨为转移,增加了阿以实现和平的难度,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变得有利于以色列。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变得更为孤立。

哈马斯政府上台后,以色列和美国不仅不承认民选的哈马斯政府在巴勒斯坦的合法统治,而且通过公开支持法塔赫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不断挑起巴勒斯坦的内部纷争。2007年5月20日,以色列安全内阁决定,以军将加强在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可能对哈马斯政府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简称“杰哈德”)中的高级官员实行“定点清除”,继续加大打击巴勒斯坦的力度。^④约旦国王阿卜杜拉5月18日在第五届世界经济论坛中东会议开幕发言中警告,“巴以和平进程已经没有任何空间和时间能够接受后退和拖延,必须立即实现和平”。^⑤然而,警告归警告,巴以之间的和平仍然看不到实现的曙光。6月14日,阿巴斯解散哈马斯领导的政府后,巴勒斯坦内部两派的火并进一步升级。15日清晨,哈马斯宣布全面控制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从此分裂为两个部分:由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和得到美国与西方世界支持的法塔赫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认为,“这起事件是1967年以来最糟糕的,不幸的是它使我们倒退,倒退了许多年”。^⑥巴勒

¹ 于时语:《中东的绝症——巴勒斯坦问题》,载《联合早报》,2007年5月25日。

^④ 《以色列称将定点清除哈马斯高官》,载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2007-05/21/content_876470.htm。

^⑤ 苏小坡、胡浩:《综述:繁荣还是崩溃——中东面临未来抉择》,载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5/20/content_6127683.htm, 2007年5月20日。

^⑥ Sakher Abu Eloun, “Palestinians Divided as Hamas Rules in Gaza”, *Middle East Times*, June 15, 2007.

斯坦独立建国的梦想以及阿以和平的实现都变得更加遥远。

(四)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和伊朗捐弃前嫌

伊拉克战争使得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不仅在阿拉伯世界出了第一位库尔德人总统,而且由于实现了伊拉克的联邦化,库尔德人获得了事实上的自治,还加强了对北部主要产油区的控制。在伊拉克新议会,库尔德政党联盟是继什叶派政党联盟和逊尼派政党联盟之后的第三大政治势力,掌握了关键少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库尔德人梦寐以求的独立梦,终于在萨达姆垮台后的伊拉克初步得到实现。

伊拉克的新局面,为同为库尔德问题所困扰的土耳其和伊朗两个敌对国家找到了接近的理由。如前所述,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国。伊拉克库尔德人在战后伊拉克政治上一步步坐大的事实,形成了对土耳其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早在战争开打之际,作为北约盟国的土耳其公然拒绝美国借道其东南边境开辟伊拉克北方战场的要求,迫使美军不得不调整战争方案。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土耳其担心生活在其境内的库尔德人乘势扩大影响,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里应外合。此前,土耳其就不仅对国内的库尔德人加强军事围剿,而且还时常越过土伊边境攻击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目标。

在库尔德问题上与土耳其感同身受的还有伊朗,两国目标一致,不允许在边境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伊朗总统内贾德公开支持土耳其越境清剿库尔德反叛组织的军事行动。据《亚洲时报》2006年5月中旬报道,土耳其在本国与伊朗、伊拉克三国交界山区集结了2.5万名士兵,打算切断库尔德工人党从伊拉克北部到土耳其的供给线。与此同时,伊朗从2006年5月初开始在伊朗靠近两伊边界的西北地方部署军队,协助清剿土耳其反政府的库尔德工人党。伊朗盟友叙利亚也采取了同样政策。¹5月6日,土耳其政府发表声明,对伊朗在两伊边界地区集结大量部队并派部队进入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打击伊朗库尔德工人党表示高兴。^④与此同时,伊朗和土耳其两国之间也出现一系列密切的高层接触和协调,例如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与伊朗总统内贾德2006年5月初在巴库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埃尔多安事后宣布伊朗和土耳其在核问题上的看法不存在分歧,令美国十分恼火。^⑤国际评论指出,伊朗强力支持土耳其,一方面是要清除北部安全隐患,避免美国利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入侵伊朗,另一方面也表明伊朗在因核问题而与美国“较劲”的时候,希望得到土耳其的支持。^⑥现代土耳其和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争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土耳其自1923年凯末尔革命以来的世俗化路线,遭到霍梅尼领导的什叶派革命的挑战。然而,势易时移。伊拉克战争导致其境内库尔德人政治地位的提升,迫使土耳其、伊朗两国放弃前嫌,携手打击库尔德人。由于库尔德问题的新发展,导致土耳其和伊朗两个长期对立的国家一朝和解,这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所始料不及的。民族问题国际化的内在动因由此可见一斑,也显示出中东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再次印证了英国19世纪后期的首相帕麦斯顿的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五)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成为新热点

当苏丹政府还在疲于应付南北方内战的同时,2003年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也爆发了反政府

¹ 《伊朗、土耳其两国“亲热”让美国十分不安》,载 <http://gh.chinareviewnews.com/cm-webapp/doc/docDetail.jsp?colid=&kindid=2&docid=100146515>。

^④ 《伊朗在两伊边境地区集结部队打击库尔德武装》,载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61/4349193.html>。

^⑤ 于时语:《土耳其和伊朗,化敌为友?》,载《南风窗》2006年6月15日。

^⑥ 《伊朗、土耳其两国“亲热”让美国十分不安》,载 <http://gh.chinareviewnews.com/cm-webapp/doc/docDetail.jsp?colid=&kindid=2&docid=100146515>。

的武装活动。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聚居着约 80 个部族,种族和宗教矛盾错综复杂,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居民与信奉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黑人居民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2003 年 2 月,由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达尔富尔地区动荡的局势引起了国际社会普遍关切,包括联合国、非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为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做了大量工作。2004 年,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 1556 号决议和第 1564 号决议,以改善达尔富尔地区的安全局势。2004 年 7 月和 2005 年 5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经过 2 年的艰苦谈判,2006 年 5 月 5 日,在非洲联盟的斡旋下,苏丹政府终于同达尔富尔最大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运动”的一个主要派别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达成了和平协议。根据《阿布贾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而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从而为结束达尔富尔地区长达 3 年多的流血冲突迈出关键的一步。

但是,达尔富尔民族冲突问题并非一日形成,如同南北内战一样,有着非常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中间掺杂着石油和民族矛盾,加之长期以来苏丹历届政府执行的强制同化政策所遗留的政治恶果,尽管签署了和平协议,但达尔富尔距离全面和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众所周知,达尔富尔地区形势错综复杂,多个反政府组织并存,它们分别拥兵自重,而且各有不同诉求,相互倾轧。2005 年 11 月,主张像南方一样在达尔富尔地区实行自治的“苏丹解放运动”发生分裂,签署《阿布贾和平协议》的是代表扎格哈瓦(Zaghawa)族人的原副主席米纳维,他和代表富尔(Fur)族人的原主席努尔现在都号称是“苏丹解放运动”的主席。由于米纳维长期得到其他国家扎格哈瓦族人的支持和帮助,其军事实力大于努尔派,是当地的主要军事和政治派别。此外,当地主要派别还包括极端保守的“公正与平等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该组织竭力主张与苏丹政府分享权力和资源。因此,苏丹西部的民族问题能否真正解决,还要看和平协议能否为其他各派接受和执行。

总体来看,苏丹民族冲突持续时间之久、冲突程度之剧烈、人员和财产损失之巨大,在战后中东、非洲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尽管不同地区的冲突有着各自特殊的情况,但苏丹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问题,都有一个共同因素在发挥影响,那就是阿拉伯人和当地的以黑人为主体的土著居民之间,围绕语言、文化、宗教、石油等方面存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对立。现代苏丹共和国的建立,并没能很好地处理执掌国家政治权力的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没能处理好伊斯兰教和其他民族信仰的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没能妥善处理中央和地方在石油的利益分配上的关系;中央政府自恃军政大权在握,继续旧的殖民主义政策,而地方势力也一味坚持地区保护主义,片面追求政治自治和独立,最终导致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国家陷入长期内战,外国政治势力趁机谋取私利,广大苏丹人民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如何满足国内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要求,如何在国家认同与民族特性之间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苏丹政府和人民仍然在不断探索,这对中东各国和各民族人民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六) 亚美尼亚种族屠杀问题引起国际关注

所谓“亚美尼亚种族屠杀问题”是个历史问题,但却对当今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双边关系特别是土耳其与欧盟和美国的关系投下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迫使土耳其政府不得不认真面对。

亚美尼亚地处外高加索南部,与土耳其东部接壤,历史上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离奥斯曼帝国,后作为外高加索联邦的一部分加入苏联。据亚美尼亚方面的

史料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势力高涨,在欧洲领土屡遭蚕食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试图确保从安纳托利亚到中亚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继续处在帝国的统治之下,因而对夹在两者中间、信奉基督教正教的亚美尼亚人格外仇视,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在1915年4月24日傍晚,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数百名亚美尼亚社会领导人被政府围捕并杀害,这一事件成为对亚美尼亚人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前兆。在接下来的1915—1917年期间,奥斯曼帝国对其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人实施了有组织、有计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导致150万人死亡。¹

1991年,亚美尼亚独立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为当年惨遭屠杀的先人鸣冤和要求土耳其政府道歉的政治运动。一方面在国内兴建种族灭绝纪念馆,并将大屠杀的历史写进教科书;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国际社会对大屠杀历史的承认,并将此作为亚美尼亚对外交往的重要任务之一。

面对亚美尼亚的指控,历届土耳其政府的态度都是拒不承认大屠杀的历史事实,认为在20世纪初,亚美尼亚人的大量死亡只是当年民族冲突的结果,是在亚美尼亚人联合英国和俄国公开起义反对政府并开始大肆屠杀土耳其人后,政府才决定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镇压。土耳其根据自己掌握的历史文献宣称,当时的奥斯曼帝国从没有要灭绝境内亚美尼亚人的想法,更没有制定类似的屠杀计划。在双方的冲突中,许多亚美尼亚人不幸因为饥饿和疾病而丧生,但他们的死亡并不是政府有计划、有预谋的种族屠杀(genocide)的结果。

2005年,土耳其政府声称,奥斯曼帝国留有官方文献,其中包括1914年至1918年期间奥斯曼帝国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些往来文书,显示当时处于种族动乱时期,双方互有伤亡,因此,拒绝向亚美尼亚政府及人民道歉。^④

尽管土耳其政府百般辩解,但国际社会却越来越关注这一历史问题。早在1978年,联合国就已经将这一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在后来的近30年里,欧洲议会也时常提及这一问题。2004年10月6日,欧洲议会再次希望土耳其政府就此问题与亚美尼亚达成协议,试图以此作为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某种条件。同年12月15日,就在决定正式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前两天,欧洲议会又通过了一份谴责奥斯曼帝国实施大屠杀的报告。2006年10月12日,法国国民议会更破天荒地通过一项有关奥斯曼帝国一战期间“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法案,规定任何否认该历史事件的人都将面临一年的监禁和4.5万欧元的罚款。虽然该法案最终未能成为法国法律,但它仍然引起了欧洲和土耳其各界的强烈反应。2007年10月1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议员们以27票对21票通过了亚美尼亚种族清洗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充分认识这起“种族清洗和屠杀”事件,以及这一事件“未能获得公正解决而产生的后果”,并在对土耳其外交政策中得以体现。^⑤ 尽管该议案受到美国和土耳其政府的共同施压和公开反对,美国议员的这一举动还是又一次将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摆到了国际社会面前。

目前,世界上已有21个国家正式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美国和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正式承认,但前者的39个州、后者的威尔士却都予以承认。^⑥ 可见,这起被历史尘封的旧案愈来愈成为土耳其政府摆脱不掉的现实问题。

¹ 亚美尼亚政府提出大屠杀的指控,据称是根据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撰写的被称为《蓝皮书》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的正式题目是《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的遭遇,1915—1916年》。详见龚峻岭:《亚美尼亚大屠杀:伸向未来的历史》,载《新京报》2006年10月22日。

^④ 龚峻岭:《亚美尼亚大屠杀:伸向未来的历史》,载《新京报》,2006年10月22日。

^⑤ 《土耳其抗议美国国会有关亚美尼亚大屠杀议案》,载《新京报》,2007年10月12日。

^⑥ 这21个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荷兰、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瑞典、瑞士、梵蒂冈,此外还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塞浦路斯、黎巴嫩、乌拉圭、委内瑞拉。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menian_Genocide

当年奥斯曼帝国政府究竟是否有预谋地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无论是在土耳其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存在较大争议,学术界也没能取得一致看法。但是,大量亚美尼亚人在那个时代集中死亡,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当时的强势民族,土耳其人当然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今天的土耳其人虽没义务为前帝国时代的政策和行为道歉,但有关国家的政府对该段时期的历史事实应有正确的认识,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缘何取信于亚美尼亚以及取得其他当年受到帝国统治的弱小民族的信任?欧洲国家又如何放心地接纳土耳其加入欧盟?另一方面,作为历史问题,还原历史真相显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学术问题应在学术范围内解决,政治问题则应通过有关国家的和平协商来求得共识。历史问题不能回避,但现实社会要求人们超越历史羁绊,勇于面向未来,那种动辄以诉诸国际或国内舆论来为某个政客及其所属政党造势而谋私利的做法也并不可取。有报道说,“与两国政府针锋相对的态度有所不同,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两国人民却希望尽早解决问题,发展两国关系。据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0.9%的土耳其人和62.7%的亚美尼亚人都希望两国开放边境”。¹这恐怕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土耳其和亚美尼亚的政治家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三、中东民族问题的新特点及发展前景

总之,中东地区的民族问题并非只有上述几个,只不过它们在“9·11”以来更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而已。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在其他国家如伊朗、也门、阿尔及利亚、阿联酋等国内部,也存在大量的民族关系问题,限于篇幅和资料,不能一一罗列。但从总体特征上来讲,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当代中东地区的民族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点。

(一)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

不同民族与不同的教派、不同的政治集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阿以冲突获得伊斯兰世界的高度重视,至今仍然有许多伊斯兰国家坚持不在外交上承认以色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教在发挥作用和影响;塞浦路斯问题既反映了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的矛盾,也包含了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不和;萨达姆领导的伊拉克就是在捍卫逊尼派的正统地位的旗号下,打着阿拉伯民族团结的幌子,展开与异族伊朗人争夺海湾霸权的八年战争的;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也是如此,基督教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恩怨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国家间关系,尘封久已的历史被再度发挥到现实政治中。

政治与宗教的互动,使得原本相对简单的民族矛盾逐步演变为不同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对立;而不同宗教和教派的对立,则被有心的政客和政治势力所利用,成为服务于其政治私利的意识形态工具。例如,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最初联合国决议规定由国际共管,但是自1948年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之后为外约旦所有,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为之欢呼雀跃;等到1967年第三次阿以战争中为以色列所占领,犹太人焉能不在祖先留下的西墙前喜极而泣?一方面是犹太人誓死要保卫耶路撒冷的完整和不被阿拉伯人再度抢走,另一方面是阿拉伯人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发动各种形式的“圣战”,一定要从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夺回先知曾经生活过的圣地。于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应运而生,各种宗教激进派别纷纷登场,而以色列国也迅速完成立法手续,宣布耶路撒冷为自己“永久和不可分割的首都”。政治借助于宗教的力量,完成了对各自民众的动员,耶路撒冷问题也就成为阿以冲突中最难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了。

¹ 曹轶群:《土耳其不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载《世界新闻报》,2005年4月18日。

(二)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纠缠在一起,导致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国际民族问题国内化

一国国内的民族问题往往会牵动别国的同一民族,或同一宗教的民族及有共同利益的民族,从而使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国际民族问题国内化。

例如,四个库尔德人主要生活的国家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都存在库尔德问题,但各有各的不同,可是这四个国家往往都利用别国的库尔德问题来为自己谋利,使得各自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全都离不开外国势力的干预、插手,甚至直接操控。反之,一国库尔德人在反政府或谋求更大自治权力方面取得进展,往往导致他国库尔德人政治势力跃跃欲试,而相关政府则如临大敌。阿以冲突更是如此,在泛阿拉伯主义的旗号下,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是每个阿拉伯国家的事业,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每一次战争与和平,都离不开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参与。黎巴嫩的内战,本是基督教马龙派和伊斯兰教什叶派之间的混战,巴解组织参与进来后,又招致以色列的军事介入,不仅内战拖延十几年,而且成了地地道道的国际战:以色列和亲以色列的基督教武装为一方,什叶派穆斯林和巴解组织游击队为另一方。同样,苏丹之所以独立后一直内战绵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处在边疆地区的反政府武装,都得到来自国外的同族人的公开或暗地里的支持,苏丹政府每次与分离主义势力达成妥协、签署和平协议,也都和外国势力改而支持苏丹政府有很大关系。

(三)大国与中东国家纠缠在一起,导致中东政治大国化、民族问题世界化

正如伯纳德·路易斯所言,“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从拿破仑的远征军在十八世纪末来到埃及以后,就深深地受到欧洲列强的利益、野心和行动所影响,而在其陷入危机之际,更是受到欧洲强权的利益、野心和行动所主导。到了奥斯曼政权终于回天乏术、断气西归的时候,西方列强无疑已成为中东地区的新统治者,各帝国之间的敌对,也开始以一种更直接的新方式进行”。¹ 二战结束、巴勒斯坦分治是这轮争夺的高潮。约翰·金奇评论道:巴勒斯坦问题之难于解决,同犹太人没有关系,同阿拉伯人也没有关系。说解决中东问题的钥匙在大国手里,一点也不过分。^④ 这段评述,实实在在地道出了阿以冲突久拖不决的核心问题——外部势力在中东的存在和争夺。以英国、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当代外部势力,将弥漫欧洲的犹太人受迫害问题,经由两次世界大战转嫁给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来承受,从而引发和加剧阿、犹两大民族一个世纪的流血冲突,至今战祸连绵,没有宁日。

中东地区民族问题的背后几乎都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子。西撒哈拉冲突源于西班牙在马格里布地区的殖民统治,英国显然和阿以冲突、苏丹南方问题、波斯湾三岛主权的归属脱不了干系,库尔德问题主要根源在于大国的瓜分和对库尔德人利益的背叛,阿富汗问题则来自苏联的入侵,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也是和当初奥斯曼帝国的高压统治分不开的。因此,中东许多民族问题从一开始产生就带有浓厚的国际色彩和世界化倾向。

在中东国家陆续摆脱前宗主国获得政治独立后,旧势力并不甘心就此退出殖民地的利益争夺,总是想方设法插手和干预前殖民地的内部事务,试图使刚刚获得主权独立的中东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社会模式等方面,继续延续大国的做法。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英、法纠集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打击,目的就在于迫使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继续保证英、法在运河的利益,确保英国对该战略通道的控制。苏联和美国在战争中支持埃及,目的也在于将英、法等旧势力挤出中东,进而由他们来划分新的势力范围。由于中东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地下又富藏石油,超级大国无不希望将中东各国改造成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与自己相同的国家。于是,各种各

¹ [美]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455页。

^④ [日]田上四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中东战争全史》,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336页。

样的援助、各种各样的和平方案、各种各样的经济重建与民族和解计划,无不烙上大国的印记。从中东政治的英国化,到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化,再到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化,主要大国均借助中东地区的民族冲突挤进该地区,进而再通过相应的经济、军事援助,使有关国家任由大国摆布。有关的民族问题也就自然突破地理界限的约束,成为大国国内政策辩论的主题之一。中东发生的民族问题要在华盛顿、巴黎、伦敦或纽约的议事殿堂里加以讨论和解决,早已成为中东民族问题世界化的惯例。2006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小布什领导的共和党大败,不是败在国内的某项民生政策上,而是败于2003年小布什执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战后伊拉克国内混乱的局势上。这是中东民族问题世界化的最新例证。

总之,由于当代中东民族问题所具有的上述三大特点,使得有关问题的解决前景变得越来越不乐观。尽管冷战结束后,阿以争端、两伊冲突、塞浦路斯问题等先后都在和平进程中取得一些进展,其他一些民族争端如西撒哈拉冲突、苏丹内战等也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但中东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根本的利害冲突无法调和,在可预见的将来,有关国家仍将继续面临民族问题的困扰。国际无政府状态,有能力的大国不能秉持公正立场,有关冲突的当事方固执己见、感情用事、缺乏妥协等,都将使既有的民族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此外,还有其他许多民族问题和部族及部落问题尚处于潜伏状态,一旦国内和国际形势发生变化,随时有可能引发新的争端。2005年初,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立刻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强大压力,迫使后者撤出已在黎巴嫩驻扎了几十年的叙利亚军队;2006年夏,以色列士兵被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劫持,随即遭到以色列发动的“夏雨”和“秋云”军事行动,如此等等都说明,中东地区的政治神经实在是太脆弱了,禁不得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如何真正有效地解决困扰各国的民族问题,使20世纪初就开始的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走上正确的轨道,从而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使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各民族和国家和睦相处,不仅是中东各国和各民族的头等大事,也是世界各国和人民特别是大国及其人民应该肩负的重大使命。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latest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conflicts in Afghanistan, Iraq, Palestine, Sudan and Turkey sinc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while indicating th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relig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orld, are the key elements in these ethnic conflicts.

(王联, 副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罗 葳]